

民族学评论

第二辑

Ethnological Review

Volume 2

林超民 主 编
沈海梅 副主编
杨文辉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基础字评论

— 二 —



基础字评论

Ethnological Review Volume 2

林超民 主 编
沈海梅 副主编
杨文辉



民族学评论

第二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学评论/林超民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81112-041-0

I. 民... II. 林... III. 民族学—研究 IV. 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345 号

责任编辑: 康 实 蔡红华

封面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段建堂

民族学评论

第二辑

林超民 主 编

沈海梅 杨文辉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1112-041-0/C·104

定 价: 49.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邮编: 65009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卷首语

2001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民族学通报》第一辑。转瞬间，过了三四年，仍未能出版第二辑。其主要原因当然与我们的努力不够有关。谨向作者和读者深表歉意。

《民族学通报》第一辑刊行以来，受到各方面的肯定与鼓励，希望我们把这个“集刊”办好，长期坚持下去，为中国民族学的建设与发展做一些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在当今民族学界的硕学大家、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第二辑终于编辑出版了。接受不少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集刊”的名称改为《民族学评论》。

名称变了，但是我们的宗旨不变——推动中国民族学的创新。

这是一本中国民族学的学术集刊。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学术。学术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具有深厚专业知识、专业理论与专业技巧的学者，遵循专业规矩、严守专业道德的学人，在专业条件下，按照专业特点和规律推动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创新活动。

要做到学术创新，我们应该坚持学科的独特规律，尊重学者的独立人格，肯定论文的独到见解。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创成果，学术创新就是一句空话。

要做到学术创新，我们应该讲究学术自由。谈到学术自由，一般人总认为是外在的条件，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每一个学者自身心灵的修炼。现在，我们的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忙碌，老师为了应付考核而辛苦，领导为了应付考评而奔走；学生考试为文凭，老师考核为职称，领导考评为晋升。上上下下，很少有学者真心实意、严谨求实地追求学问的创新。当你个人的身心被名缰利锁紧紧束缚之时，有何学术自由可言？只有挣脱名缰利锁的羁绊，我们的心灵才是自由的；自由的心灵才能毫无顾忌、孜孜不倦、一往无前地追求学术的真谛。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才有可能不断向前推进。

近年来“与国际接轨”是一个闪现频率很高的时髦名词。在民族学这个“舶来”的学科，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其实，学术领域在国际上从来没有统一的轨道。不要说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学没有统一的轨道，就是在美国国内也是学派林立，有何公认的轨道让大家遵循？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学派的民族学，以人家的民族学理论为理论，以人家的民族学潮流为潮流，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自己的创新观点，那我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学。我们不在意是否“与国际接轨”，我们孜孜以求的是形成中国风格的民族学。

《民族学评论》这个“集刊”当然不是“核心期刊”，也没有什么级别，我们之所以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办这个集刊，不是为了给想利用“核心期刊”沽名钓誉的人提供玩弄学术的“跑马场”，而是为有志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同仁，提供一个“商量旧学，增益新知”的学术园地。大家在这里切磋、研讨、探索、发现、创造。这里

不容许鹦鹉学舌的乖巧,不刊登趋炎附势的妙论。我们是一群为学术进步、追求真理而汇聚在一起的老实人,我们用不着为名利故弄玄虚,也用不着为富贵心摇意动,更用不着为威权摧眉折腰。我们用自己独立思考而写就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来这里“对话”。对话的规范就是真实无欺,对话的目的就是求真创新,对话的气氛则要友好轻松、活泼愉快。

林超民

2005年9月30日

目 录

卷首语	林超民 (1)
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现代意义	
——考古人类学的再阐释	李亦园 (1)
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胡鸿保 (8)
关于摩梭研究的成长与争议的批判性评论	
..... Chuan-kang Shih (施传刚) (15)	
The Other on Film	
——The Chinese Historical Ethnographic Film Series (1957 ~ 1966)	
..... Karsten Krueger (瞿开森) (34)	
民族志电影的“重塑”方法	蔡家骥 (49)
云南基诺族巴亚寨卓巴丧礼与家屋	杜玉亭 (57)
哀牢山哈尼族梯田农业的水资源利用	王清华 (72)
试探云南独龙族的族源	
——云南独龙族文化和 HLA-DRB1 基因多态性综合研究	
..... 周大鸣 梅方权 (76)	
“一根根骨”抑或是“死路一条”	
——从丧葬仪式与家屋象征看纳人的亲属关系	何撒娜 (85)
佛教寺院僧众晋升级职的飨宴：云南藏族社区信仰研究	朱文惠 (110)
云南元江县白族聚落的亲属组织	刘援朝 (126)
社区参照：香港大澳的人类学研究、教学与友情	
..... 廖迪生 张兆和 著 黄兴球 译 (162)	
白语地名考索	杨文辉 (171)
西双版纳傣族巴利动、名词语法考	
——以 Pabbajākamr (《出家业经》) 为例	姚 珏 (185)
从考古资料看牛与滇国社会的关系	
——以滇国青铜器为例	董晓京 (202)
Yunnan's "Native Militias" (Tulian) and The Qing Empire	
..... C. Patterson Giersch (纪若诚) (211)	
War Stories in Lienu Zhuan:	
Women in Yunnan's Ethnic Wa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Shen Haimei (沈海梅) Shen Haiying (沈海英) (233)	

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	潘先林 (248)
白族形成问题新探	林超民 (268)
中华民族的待老之道 ——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展开的讨论	钟 年 余 霞 (308)
Comparing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Tendency betwee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Su-Yueh Wu (吴素月) (316)
民族平等与国家统一 ——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论其民族思想	文 婷 (326)

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现代意义

——考古人类学的再阐释

李亦园^①

摘要：近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讨论中，有“主观”与“客观”两大派的争议。所谓客观文化特质，不应该只限于那些可看得见的特质，也应该包括很多看不见、“不可观察”的思维部分，这些抽象不可观察的文化特质经常是较难变化的，却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从这样的立场上看，所谓“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很难分辨。“延续”的文化特质一直持续成为中国文明的内在基调。“延续”的文化基调与中国式的“融于一体”理念，是值得再深加探讨的关键问题。“至中和”文化包含个体、自然、人际三个层面和谐均衡。由于强调和谐与均衡，视个人、天下、宇宙脉动讯息共振为最高境界，所以尊奉“融于一体”为文化的主旋律。“融于一体”主旋律存在于延续，却也依赖对“多元”成分的尊重，而不只是吸收，甚至是同化的心理。文化多元的理论是人类学家从人类的生物性推衍而来的理论。“全球化”的真谛确实非得在“和而不同”或“致中和”的精神价值之下进行不可，这就是古老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延续 致中和 普世价值

前言

2002年秋天，作者曾在贵州省贵阳市郊一处风景极佳的度假村参加了一次称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学术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中致辞，因而曾对所谓“多元一体架构”的内涵稍作个人意见的陈述，但是因为开幕致辞，时间短促，不容许有完整的表达。会后一直觉得这一论题十分重要，应该把我自己体会的意见较完整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今年恰巧云南大学副校长林超民先生来台湾访问，向我邀约为他主编的《民族学评论》写稿，于是就利用这一机会把原稿扩大改写成学院式论稿，提出供同行参考指教。

所谓“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同行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社会人类学界的宗师费孝

^①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通先生所提出的^①,而在费先生提出这一理念之前后,作者曾经很荣幸地与费先生当面请教并作详细的对话与讨论^②,因而对之有较多的认识作为进一步思考的材料。如今加以整理写出来,一方面可以再就教于费先生,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把论题再延伸扩大,增加其影响面,应是一举两得的事。

一、“民族”与“文化”的多元一体

其实费孝通先生原来提出的话题本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非“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不过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虽是不同范畴,但却有其相当互通之处,而“文化”与“民族”两概念同异之处急需细加厘清;并且所谓“多元一体”的理念中,“多元”与“一体”也有其可分可合的讨论之处,所以让我借此机会先就这两对名词作一论析,应该对论题的了解会有所助益。

首先应该从“民族”与“文化”的内涵说起。关于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近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讨论中,就有“主观”与“客观”两大派别的争议。譬如说欧洲学界有所谓“族群理论”者,他们主张民族或族群的认定不应用客观的文化特质为标准,而应以主观的自我认同为依据。换言之,族群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客观的文化特质如语言、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甚至身体特征都是易于变换的,不足以作为族群认定的标准,只有自我认同的意识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准则。实际上最早提出这种理论的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Edmund Leach 教授,他认为他调查的北缅甸克钦人(Kachin,国内称为景颇)在客观的民族文化上与邻近的掸族人^③实无太大差距,只是克钦人主观地自认为是另一个族群,所以克钦就成为是一个有别于掸族的族群^④。这一种主观认同的族群理论自1969年另一学者 Fredrik Barth 编的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一书出版以后,就在人类学界大为流行,成为一种新的族群典范理论^⑤。这一新理论确很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其弱点,同时也常被有意无意地误用或延伸解释,所以很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史家就对我们“中华民族”甚至“汉族”的存在以族群理论提出很多质疑。

我自己对族群理论也能欣赏,但也有一些批评与疑问。首先我认为所谓客观文化特质,不应该只限定于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特质,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乃至体质特征等,我觉得把“文化”限定在这些“可观察”的特质内是误解了“文化”,“文化”应该也包括很多看不见、“不可观察”的思维部分,或者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文法”那一部分,例如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宇宙观、人观,甚至于逻辑架构等等^⑥。这些抽象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讲座演讲,1988年。收于《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81~419页。

② 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讲座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讲时,作者曾在座并参与讨论;其后又曾于1998年6月28日在费先生府上与费先生请教座谈,记录见《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见《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又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第19~25页;又见《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79~399页。

③ 编者注:缅甸民族之一,大部分居住在掸邦(自治邦名)。

④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⑤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rwin, 1969.

⑥ 有关所谓“不可观察的文化”或“文化的文法”,请参见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一):说文化》,见《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0页。

不可观察的文化特质经常是较难变化的，却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实在是不可忽略的。自然有人要说：既然是抽象思维的部分，应该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了。但是那些内在思维的深层文化结构难道不是被文化研究者客观分析并且认定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部分吗？从这样的立场去看，所谓“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岂不是已经很难再分辨了。

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有关中国民族的内在文化特性的问题。我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容纳、吸收不同文化成分于其中的主体观念存在，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理念的根源，这些虽不是中国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特性，却是理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人类学家、民族史家所共同体会得到的。这种容纳、吸收的多元一体基本思维体系，也许是几千年来不断综合环境调适与资源互补所形成的。换言之，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存在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周边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笼罩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转。每一历史阶段、每一历史过程的剖面，都有可看做是接受这一主旋律的一个阶段或过程；在每一阶段中我们都可观察到周边民族一方面接受了“融于一体”的基本观念，但又在做某一程序推拒徘徊的状态。这种情形显然与缺乏“融于一体”主旋律的西欧民族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文化思维中只存在如何分辨“你群”与“我群”之别，而忽略掉别的文化中却是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群的“另类”想法。因此用这种不知有“另类”想法的族群理论来看待中国民族文化的过程与现象，就觉得是格格不入，而认为有悖常规的行为，这是强调发现文化偏见的文化人类学家所不该犯的过错。换言之，族群理论的主观认同模式，假如只用欧洲人的观点去解释，仍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假如能无偏见地体会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性，其解释能力就将有更大的空间了，这也就是“多元一体”理念的理论基础所在。

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融于一体”的主旋律呢？这就是要更深入地从上面所说的文化内在规律或“文化的文法”中去探寻。下面我要举出两个相关的理论来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其一是张光直先生的中西文化“延续”与“断裂”差异理论，另一则是我自己的“致中和宇宙观”模型。

二、中西文化“延续”与“断裂”理论

出生于北京而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台湾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博士，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最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专著多种，其中《延续与断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一文特别对古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有精彩的剖析^①。张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始于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的阶段，他称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文化从野蛮进入文明时是一种“延续性”的发展，而西方文化在这一阶段则是一种“断裂性”的发展。所谓“延续性”与“断裂性”是指很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指金属器具发明之后生产工具的变化而言。西方文化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代表是两河流域的“苏末”文化（Sumerian），苏末的金属

^① 文刊《九州岛学志》，1986年，第1~8页；又刊于张光直著《美术、神话与祭祀》，台北稻乡出版社1994年版。

器具发明是用在农业的生产工具上,而与较早用石器于生产是有明显的分别的,所以在工具利用的性质上是一种断裂;但在中国金属青铜器在黄土地区出现的夏末商初起用之时,是用在政治与宗教仪式上,而生产工具则仍沿用原有的石、木、骨、蚌等,所以说是一种延续。然而这种延续的关系也同时表现在人际关系、文字的应用、城乡关系、财富累积与集中、权力的获得乃至意识形态的表现上。为了要使张先生的这种东西文化“延续”与“断裂”差别特性更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不妨把他所提出的各项文化要项列如下表(表1):

表1 张光直先生对中西文明出现过程差异理论的表解

	中国文明延续性的变化	西方(苏末)文明断裂性的变化
生产工具	石、木、骨、蚌器的延续(青铜器用于政治、宗教、祭祀与兵戎)	金属器的应用于生产
人际关系	氏族、宗族的延续	地缘团体取代亲缘
文字的应用	亲族及宗教仪式为主	技术、贸易的记录(契约社会的出现)
城乡关系	原有氏族关系延续,政教中心为城市	城乡分离,交易中心为城市
财富累积与集中	经由政治及仪式手段	经由技术发明与贸易手段
权力的获得	政治与宗教的结合 巫师(Shaman)与圣王的统治	国家与庙宇的分立
意识形态	人与自然及超自然的“联续”[存有的延续(Continuity of being)]	人与自然及超自然的分隔与对立

在上述这些文化项目的延续性表现上,张先生又特别强调权力的获得与意识形态两个项目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夏朝至殷商在政治形态上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政治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巫觋或萨满与圣王政治领袖的共同统治传统并未作任何改变,而在苏末文明中政治殿堂与庙宇分立是很清楚的事。而且在中国巫觋与圣王的统合情况下,巫者对文化的影响力就特别扩大,尤其是巫者企图沟通人神之间的意识形态就更具塑模力量。张先生在后期有许多研究牵涉到巫者的作用及其所用的工具与纹饰(包括外方内圆的玉琮以及来往于天地两界的动物图像)等等,就是因为巫者在促进“延续性”文化价值观与宇宙观有其独特的作用而起。可是张先生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能有时间更进一步解释古代中国的巫者所提倡的延续性宇宙观与价值观的详细内容,当然也来不及讨论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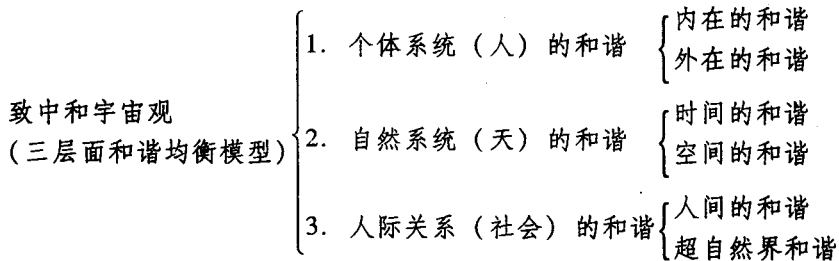
关键性的巫者宇宙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形成的机制是如何^①。然而张先生所说的东西文化“延续”与“断裂”特性却一直成为理解后来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用最简单的话来先作说明，那就是“延续”的文化特性一直持续成为中国文明的内在基调，而西方文化的基调则继续其断裂的特性，而“延续”的文化基调与本文所强调中国式的“融于一体”理念，以及“延续”文化基调与西方族群观念中你我群体之分的主观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很值得再深加探讨的关键问题。

三、致中和宇宙观：三层面和谐均衡架构

与张光直先生相似，我个人也有一个试图解释中国文化内在规则的理论模型，称之为“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我个人多年来研究民间信仰及其相关的仪式，形成了一个理论架构，认为从传统民间信仰的种种仪式与信念中可以看出，汉民族最基础的内在文化指令是寻求自己内在身体与周边人际关系乃至于自然界的和谐均衡关系，以为只要达到这些关系的和谐均衡，人们就可以健康，国家社会就可以安乐，而人神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这也就很像是《中庸》所说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此就称之为“致中和”宇宙观或“致中和”文化。这一理论架构可以表示为如下的三个层面，因此也常称为“三层面和谐均衡模型”^②：



我认为假如详细分析张光直先生所说古代巫者的意识形态，应该就与这个致中和模型很接近，因为巫者相信他自己有能力与神界沟通，他们认为神与人是一个可以沟通的

① 张光直先生于2001年1月3日病逝于美国波士顿。

② 有关“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理论内容与形成过程，请参照下列拙作诸论文：

(1) 1988年：《和谐与均衡：民间信仰中的宇宙诠释与心灵慰藉模型》(林治平编)：《现代人心灵的真空及其补偿》，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2) 1994年：《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汉学研究》，第12卷第1期，台北。
 (3) 2000年：《和谐与超越——中国传统气的内在修炼文化的个人观察》，《气文化与传统医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连续体,只要维持这个连续体之间的相互和谐,而且依照相同的模式去维持其他关系的平衡,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应该就是受这一和谐均衡的意识形态或宇宙观之影响,于是形成了古代中华文化在转变过程中强调“延续性”而非“断裂性”的根源。

但是古代的巫者是怎样形成这种“致中和”宇宙观的呢?这又是我自己近年来主持一个称为“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科技研究计划的重心,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张光直先生在担任台北中研院副院长任内有意促成的。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探讨古代中国人如何藉“内在体验”(embodiment)形成经脉的医药传统以及“内在超越”的哲学伦理思维。在目前的阶段,我们的研究团队大致都同意这种内在体验的传统即来自古代的巫覡,他们凭借内在修炼,包括导引、练气、按跷、技击等等功夫,从体内经脉腑脏和谐均衡的实践而发展与自然讯息的和谐交流,乃逐渐形成“致中和”的宇宙观文化。我们可以说包括夏朝的大禹王在内,本身即是圣王与巫者的结合,巫者传统中常说到的所谓“禹步”,即是大禹王内在修炼的舞步,这位黄土高原孕育出来的文化英雄自己即是利用这种修炼的舞步,治好了因多年治水而患上的脚疾!

四、延续与致中和、多元与一体

从上面所说的“延续”与“致中和”两个理论模型的简单阐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内在结构特性的包含并纳“融于一体”传统之悠久历史根源。由于强调“延续”而非“断裂”,视个人与天下、宇宙是一个连续体,所以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能包容不同的成分;由于强调和谐与均衡,视个人、天下、宇宙脉动讯息共振为最高理想境界,所以尊奉“融于一体”为文化的主旋律。然而所谓“融于一体”主旋律的存在与延续,却也依赖于对“多元”成分的尊重,而不只是吸收,甚至是同化的心态,这也应该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另一理念:“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甚或“和而不同”之原意^①,那就是说不不但要有包容、忍耐、吸收的心态,而且还要进一步能尊重、欣赏异族的文化,才能美别人之美,更能使别人之美得以有各自表现的机会。这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的文化特性不但是几千年来使中华文化长久如“雪球”般扩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是长此以往可以成为全人类共存相处的主要文化典范。因为如从人类学全貌性(holistic)的观点而论,文化多元的理念实在不是一种口号而已,这是人类学家从人类的生物性推衍而来的理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大致都要保持其基因特性的多元化,避免走入“特化”(specialization)的道路,以免环境变化而不能适应。很多古代的生物种属,都是因为“过分适应”而走上体质特化的死胡同,最终走上灭绝的道路。人类是一种生物,不但其生物性的身体要保持多元适应的状态,即使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是受生物演化规律严格的约束,必须尽量保持多样性的情况,以备有一天环境巨大变化时的重新适应之需。西方文化的发展已有“特化”的趋势,今天面临的能源危机、核子扩散危机、变种病毒侵袭等等都是其征兆,因此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见《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142页。

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这也就是提倡容忍别人、了解别人、欣赏别人的多元文化理论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美人之美”的根本原意了。

五、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

当然所谓“融于一体”的理念，也常会受到不同文化的人的批评，说是“大汉沙文主义”，甚至说是“东方帝国主义”。这样的批评其实都是似是而非，主要是不了解文化内在结构而致的误解。譬如说在当前所谓“全球化”风行的趋势情况下，前文所说的“致中和”或“和而不同”的观念，却是特别有其当代意义的观念，因为所谓全球化的真谛应该如上节所说的乃是一种多元的统合，而不是一元化的统一；要在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的状况下进行统合，确实非要在“和而不同”或“致中和”的精神价值之下进行不可，这就是古老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再说，“致中和”宇宙观架构下的三层面和谐均衡模型也是极富有普世价值的观念；首先与自然界的和谐，讲究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存在，而不是控制、征服自然，这在当前注重自然生态保育以及调节资源的浪费等要项上，无疑也是很关键的理念；而在讲究以伦理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上，一向也认为是弥补西方利己个人主义过分膨胀的重要价值取向。至于个体内在均衡的层面上，其意义也不仅表现在中国传统医药的养生预防观念，更优于西方医学症候治疗的传统；而且更在“身体内在验证”的过程中开拓保存了有别于西方外在实验的人类认知途径，这在知识论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我国古代巫者厉行的与自然信息直接沟通的传统，形成了传统宗教信仰中人神沟通的直接管道；实际上，我国民间信仰中的神明无不是有功于世人的圣者，这与西方犹太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那种唯我独尊而有绝对权威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态度是宽恕而包容的，这与西方排斥、仇视异教也是大异其趣。如此说来，在今日这种宗教冲突日趋激烈的状况下，以我中华文化中的宽恕、包容的宗教态度与理念，岂不是更可以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调停宗教冲突与仇视的好准则吗？

总之，代表东亚大地孕育的中华文明确实蕴含着许多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有利于化解矛盾的普世价值，只是这些蕴含的普世文化价值该如何转化并能为世人所认知而加以运用，则是我们这一代中华文化传播人所应积极努力的方向。

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Professor Lin Yao-hua and the Ethnic Studies in New China

胡鸿保^①

摘 要: 林耀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人类学家, 在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实践和民族学学科建设活动中, 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经受了历次运动的考验,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民族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进行学术反思、总结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对于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依然需要克服一定的困难。

关键词: 学术史 民族研究 人类学 林耀华 新中国

Abstract: Professor Lin Yao-hua was a famous Chinese anthropologist with high fam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before Liberation.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peoples'republic, as a communist from the old intellectuals, he suffered a lot in those political movements on by one. Meanwhile, 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in the enterprise of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Now it is necessary to do reflection and make a summary to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However, as to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of New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obstacles wants to be overcome.

Key words: academic history ethnic study anthropology Lin Yao-hua New China.

我国的历史, 浩森博大, 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 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

——江泽民^②

林耀华先生(1910~2000)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学者, 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以《金翼》、《凉山夷家》、《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而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

^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② 引自江泽民致白寿彝的信, 见《史学史研究》, 1999年版(3)。

的地位^①。英伦学究莫里斯·弗里德曼的弟子们就认为,林耀华和费孝通、田汝康开启了一条“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它对于“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的弗里德曼有不可低估的影响^②。不过,本文要集中评论的是林耀华对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以及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③。林耀华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费孝通和林耀华在1956年主持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是年5月在列宁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林耀华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此文。1957年3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名为《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事过不久,民族学与作为民族学家的费孝通便遭受不测风云,历史转入沉重的一页。《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④,其中的一些见解至今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比如他们认为,一门学科应该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先从定义入手;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一切民族在内,而不是单单关注落后人群或少数民族:

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之外。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以苏联民族学为榜样,批判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而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

民族学在中国还可以说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还有许多人对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为了避免各种讨论成为学究式的辩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学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并不依靠开始时把范围划好、界碑树好,而是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实际生活是丰富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能从这个丰富和变化的源泉出发,它的工作也会是活泼的、常新的。我们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为中国民族学提出它的任务的^⑤。

①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庄孔韶:《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载林耀华《义序宗族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② Hugh D. R. Baker (裴达礼), Stephan Feuchtwang (王斯福) ed., *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in Memory of Maurice Freedman*, Oxford: JASO, 1991,《序言》。杨春宇、胡鸿保:《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开放时代》(广州)2001年版(11)。

③ 详细情况可参考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原载《科学通报》1956年版(8);单行本,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

⑤ 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4页。